

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

书籍之路 与 文化交流

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／再论茶祖荣西像／关于来日僧西涧
子云／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／江戸时代的中国占
卜术书之传播与马场信武／论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籍之译介

王 勇 主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

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

王勇 主编

G256.1-53
W432

G256.1-1
W432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/王勇编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9. 12

(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816 - 2

I. 书... II. 王... III. 中日关系—文化交流—图书史—
文集 IV. G256.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1331 号

本书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

责任编辑 蒋惠雍 冯 一
特约编审 任余白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8.875 插页 2 字数 456 000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816 - 2/K · 611

定价: 5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66511611

序 言

古今中外，民族、国家、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，离不开“人”与“物”。然而，文化传播的模式，随时代而更替，因空间而变化，并非千篇一律。

纵向审视，“人”的比重随时消长。追溯交通手段单一的古代，“物”伴随“人”的移动而流通，“人”在文化传播中扮演主角；迨至商品经济及交通手段发达的近代，“物”逐渐摆脱“人”的束缚，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。简言之，在各个时期的区域文化交流中，“人”与“物”的关系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，两者不可等量观之。

横向观察，“物”的类别因地而异。汉代以来中国丝绸向西传播，在东西方之间形成所谓的“丝绸之路”；古代东亚各国之间，因较早普及蚕桑技术，丝绸并非最主要的流通物资，而以汉字为媒介的书籍广为流布，形成一条往返环流的“书籍之路”。概言之，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，因地缘、历史、传统、风俗等而各具特色，其内容及形式不可能划一。

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均起源于中国，前者承载物质文明向西延展，后者挟裹精神文明往东传送，所到之处无不开花结果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追寻往古、探视东西，眼前呈现两种迥然有异的景观——丝绸早已化为过眼烟云，典籍依然伴有琅琅书声。

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

我们在多年从事区域文化交流研究基础上,逐渐达成一种共识: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,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;东亚各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自成格局,既包含丰富的内容,又具有独特的形式。

为了在实践中验证上述思路,构建东亚别具一格的文化交流模式,我们自2004年开始举办“东亚文化交流”系列学术研讨会,如“道教与日本文化”(2004年)、“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”(2006年)、“遣隋使与遣唐使”(2007年)、“东亚人物往来”(2008年)等,规模都在100人左右,其中将近一半为海外学者。

2006年在杭州召开的“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”国际研讨会,由(中国)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与(日本)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学COE(国家基地)联合主办。会议正式代表108名,其中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英国、越南、泰国、比利时等国的学者41名;会议共录取43篇学术论文,在古代、中世、近世、近现代、综合5个分科会宣读交流。

本书从会议论文中精选出25篇,厘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5编。甲编“基调演讲”收稿2篇,系王勇、佐藤进代表主办单位所作演讲的纪录;乙编“古代中日书籍交流”收稿6篇,以古代、中世分科会论文为主,时间上截止于明代,约略相当于日本江户时代之前;丙编“近代中日书籍交流”收稿8篇,涵盖清代及民国初期,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;丁编“东亚书籍交流”收稿6篇,不按年代排序分类,将内容不限于中日而涉及东亚其他国家的论文汇集于此;戊编“图书版本研究”收稿3篇,与前面4编侧重于历史学不同,此编均为图书文献学专论,从一个侧面揭示“书籍之路”是个跨学科领域。

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
王 勇

目 录

序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甲编 基调演讲

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	王 勇	3
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	[日] 佐藤进	18

乙编 古代中日书籍交流

《坤元录》屏风诗	[日] 后藤昭雄	47
试论《明一传》与《七代记》	[日] 榊佳子	62
《因明论疏明灯抄》对汉籍的引用	[日] 河野贵美子	82
“王仁献书说”探实	王铁钧	104
再论茶祖荣西像	[日] 米田真理子	117
关于来日僧西涧子昙	[日] 仁木夏实	138

丙编 近代中日书籍交流

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	周振鹤	159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

《游仙窟》回传中国考	金程宇	174
把卧游之趣带给“幼童之辈”	唐 权	213
江户时代的中国占卜术书之传播与 马场信武	[美] 海克·马蒂尔斯	244
近代日本汉籍的流入	[日] 富田昇	264
东文学社与《支那通史》及《东洋史要》	邹振环	299
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的汉籍流通	[日] 川边雄大	326
论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籍之译介	孔 颖	348

丁编 东亚书籍交流

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	张伯伟	369
明清册封使别集中所见琉球史料	王 菡	409
中国、朝鲜、日本的咏史乐府	[韩] 沈庆昊	434
曲直濂养安院家与朝鲜本医书	[日] 町泉寿郎	442
《明心宝鉴》在越南的流播与影响	何成轩	471
《文心雕龙》与《文赋》传入韩国时期考	[韩] 朴现圭	489

戊编 图书版本研究

嘉业堂藏书的流布及其与日本的关系	李 庆	503
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日本汉籍之来源、特色与 价值	张宝三	537
长泽规矩也在版本学及印刷史领域的贡献	陈东辉	576

甲编 基调演讲

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

王 勇*

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,由鉴真开创的律宗列“南都六宗”〔1〕之一,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,还涉及建筑、美术、工艺、书法、医学等,甚至连传播豆腐、香木、砂糖、纳豆、茶道、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簿上。本文侧重于鉴真对日本文化影响的深度,认为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,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,故从“书籍之路”的文明观出发,对以前几乎无人涉及的鉴真携带经卷及书法作品进行考证,并追踪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的直接影响。

大约十年前,我提出“书籍之路”的概念,意在突破“丝绸之路”的传统思路,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。〔2〕众所周知,“丝绸之路”一词由德国人李希霍芬首创,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西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。进入20世纪中期,好事者不断为之添枝加叶,遂使“丝绸之路”四通八达,无所不至。这个学术词汇甚至沾

*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。

〔1〕 南都六宗:指日本奈良时代先后形成的六个佛教宗派,即华严宗、法性(法相)宗、三论宗、律宗、俱舍宗、成实宗。

〔2〕 有关“书籍之路”的基本观点,请参照王勇《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》,载《浙江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科版)2003年5期,2003年9月,第5—12页。

染商业气息,逐渐变得名不副实了。

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,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。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“羊毛树”上采集而来时,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,生产丝绸了。追溯中日古代历史,我们发现持续性的、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,其影响或许不及陶瓷。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,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,而是当时西方人大概不屑一顾的书籍。

倡导“书籍之路”之用意,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,无论内容、形式,还是意义、影响,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“丝绸之路”。简而言之,中国与西域的交流,主要体现在以“丝绸”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;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,则主要体现在以“书籍”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。前者虽然能暂时地、表面地、局部地装点某个地区的文明景观,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文明内质;后者则可以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,成为该民族创造文明的源泉。

本文试图从“书籍之路”角度切入,探讨鉴真僧团携往日本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。

一、《大炎经》辨误

鉴真东渡的结果,确实对日本文化形成深远影响;如果回归到出发点,鉴真所传播的中国文化,可以从他的携带品中窥取端倪。

鉴真六次东渡中,留下比较完整携带物品清单的是第二次和第六次。唐天宝二年(743)四月,第一次东渡因新罗僧如海诬告而失败;同年十二月,鉴真率从僧十七名、工匠八十五人,再次从扬州出海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了他们当时携带的物品,这是一份罗列种种名物的冗长单子,诸本之间的差异颇大,兹据大正本引录与书籍

相关的前半部分：

兼将……金字华严经一部。金字大品经一部。金字大集经一部。金字大涅槃经一部。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。〔1〕

这里四部金字佛经、一百部经论章疏，构成鉴真的佛学体系，值得仔细考量。遗憾的是，经论章疏没有列出书目，无法窥其全豹。至于四部金字佛经，经以多种古写本校勘，发现“大涅槃经”四字诸本皆同，唯观甲本（即东寺观智院甲本，平安时代古写本）与诸本异：“大”和“经”之间为一字，合计三字。关于此三字，西崎亨、藏中进均录作“大炎经”〔2〕。那么，“大炎经”与“大涅槃经”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
笔者曾经花费很多精力查找“大炎经”的来历，迄今没找到答案；还询问过中日两国的佛学专家，他们都表示从未听说过《大炎经》这部佛经。

然而经过仔细辨识观甲本的字迹，终于发现一些线索：即被西崎亨、藏中进录为“炎”的汉字，下部确实是个“火”，但上部笔画有点奇特（图1）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中，在叙述鉴真第五次东渡时漂到海南岛，因南方炎热而得眼疾的一段中，也出现了个“炎”字（图2）。比较这两个“炎”字可以发现：图2的“炎”字

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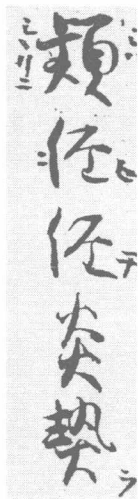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〔1〕〔日〕真人元开：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105册，名著普及会1979年版，第989页。

〔2〕参见〔日〕西崎亨：《〈唐大和上东征传〉之研究》，1973年自印本，第9页；〔日〕藏中进：《〈唐大和上东征传〉之研究》，樱枫社1976年版，第585页。

上部是个“火”(三画),图1的“炎”字上部是个“七”(二画)。为了确认,笔者对观甲本的“火”字(包括偏旁)做了调查,最后一笔均为“、”,因而对“大涅槃”的“炎”字产生怀疑。

“七”与“火”上下结构组成的“𤇓”,其实是个佛教中的俗字,意思就是“涅槃”(《今昔文字镜》)。表示“菩萨”的“𤇓”是个合形字,表示“涅槃”的“𤇓”大概是取意字。“涅槃”古作“泥洹”,汉翻为“灭度”。《隋书》卷三十五即载有:“涅槃亦曰泥洹,译言灭度。”〔1〕佛经中“七火”是万物寂灭的根本原因,两者应该有词义上的关联。观甲本多用俗字,从图3(第二行最后四字)可见“佛菩萨障子”的“菩萨”连笔写作“𤇓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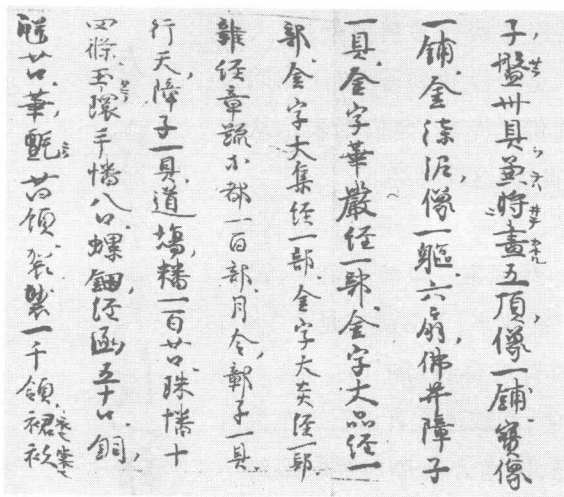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

“大涅槃经”全称“大般涅槃经”，也可略作“涅槃经”，先后数译，传本繁多。仅大乘系统译本，存世的就有四种：法显译《大般泥洹经》六卷；昙无讖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四十卷；慧观、慧严、谢灵运等编《大

〔1〕 魏徵等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，第1096页。

般涅槃经》三十六卷；会宁、若那跋陀罗译《大般涅槃经后分》二卷。此外，还有小乘系统的译本数种。鉴真准备携往日本的《大般涅槃经》，究竟是哪一种传本呢？

二、南本《涅槃经》

鉴真第二次东渡遇风浪受挫，货单所列物品自然没有带到日本。但以后几次东渡，所带物品大致相同。据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，天宝七载（748）第五次东渡时，“造舟买香药，备办百物，一如天宝二载所备”。〔1〕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所列第六次东渡货单，是实际带到日本的物品。比照第二次东渡的货单，佛经多出《大佛名经》一种。兹据大正本引录如次：

金字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八十卷。《大佛名经》十六卷。金字《大品经》一部。金字《大集经》一部。南本《涅槃经》一部四十卷。〔2〕

诸本著录的佛经品目互有出入，古写本如观甲本、观乙本、高山寺本均只列出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、《大佛名经》、南本《涅槃经》，少了《大品经》、《大集经》两种，而且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不是金字经。而各本完全一致的“南本《涅槃经》”，应该相当于第二次东渡携带的“金字《大涅槃经》”。

前面提到现存大乘系统的《涅槃经》共有四种，大正本记录的“南本《涅槃经》一部四十卷”，究竟对应于哪一种呢？法显译《大般泥洹经》为六卷，会宁、若那跋陀罗译《大般涅槃经后分》系二卷，卷帙明显

〔1〕〔日〕真人元开：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105册，名著普及会1979年版，第990页。

〔2〕同上书，第993页。

不符；昙无讖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四十卷，卷数正好相合。

据《高僧传·昙无讖传》，昙无讖(385—433)本中天竺(印度)人，婆罗门种出身，自幼习学小乘咒术、五明等，后遇白头禅师得《涅槃经》，遂改习大乘。南北朝时期，携《涅槃经》前分等入罽宾、龟兹，因二地多学小乘，遂东经鄯善至敦煌。北凉玄始元年(412)，河西王蒙逊闻其名，迎入姑臧，于此翻译《涅槃经》前分，其后赴于阗寻得《涅槃经》余品陆续译出。时北魏太武帝慕名迎请，蒙逊恐其之多术为魏所用，在其西归更求《涅槃经》后分途中害之。昙无讖是北凉时期著名译经师，所译《涅槃经》世称“北本”，与鉴真携往日本的“南本”不符。

宋元嘉年间(424—456)，昙无讖所译“北本”传至南方，慧观、慧严、谢灵运等人因其文字简朴、分品粗疏，参照法显译本六卷十八品、昙无讖译本四十卷十三品，修订润色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，世称“南本”。

“南本”因文字流畅，品目分明，比“北本”更为流行。颜真卿《宝应寺翻经台记》赞扬谢灵运云：“以昙无讖所翻《大涅槃经》语小朴质，不甚流丽，乃与沙门范惠严、匡慧观依旧《泥洹经》共为润色，勒成三十六卷。义理昭畅，质文相宣，历代宝之，行于天下。”^{〔1〕}由此观之，“南本”在唐代颇为风行，鉴真将之携往日本，也是言之成理之事。

然而，“南本”应该是三十六卷，大正本却作“四十卷”；核对古写本，高山寺本作“卅卷”，观甲本在“卅卷”旁注“卅八卷”，观乙本作“卅八卷”。看来古写本中至少有一个系统作“三十八卷”，依然比通行的“南本”多出二卷。

〔1〕唐代僧人元康在《肇论疏》中对谢灵运的修治加以肯定：“谢灵运文章秀发，超迈古今，如《涅槃》元来质朴，本言‘手拖脚踏，得到彼岸’，谢改为‘运手动足，截流而渡’。”

《涅槃经》分为前分、中分、后分，上述法显译本及“北本”、“南本”均缺损后分四品。《大般涅槃经后分》以“遗教品”起首，共分二卷四品，叙述佛陀的最后教诫以及入灭、火化、舍利供养等事。昙无讖、慧观、道普等人都曾努力寻求而未果，一直到唐初才由律师会宁前往天竺求得，麟德年间(664—665)与若那跋陀罗共同译出，于是全本《涅槃经》译事终告竣工。

综上所述，鉴真传入日本的不是子虚乌有的《大炎经》，而是三十六卷本的“南本”《涅槃经》；至于卷数为三十八卷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是包括了唐代新译的《大般涅槃经后分》二卷四品。这个事例或许可以说明，鉴真带往日本的佛教书籍，代表着唐代译经事业及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三、“天竺朱和等杂体书”

鉴真第二次东渡货单，仅列出四部佛经，经论章疏只是笼统地说“都一百部”，没有具体细目。第六次东渡货单则有四十三部经论章疏的书目。兹据大正本引录如次：

《四分律》一部六十卷。法励师《四分疏》五本各十卷。光统律师《四分疏》百二十纸。《镜中记》二本。智周师《菩萨戒疏》五卷。灵溪释子《菩萨戒疏》二卷。《天台止观法门》。《玄义》《文句》各十卷。《四教仪》十二卷。《次第禅门》十一卷。《行法华忏法》一卷。《小止观》一卷。《六妙门》一卷。《明了论》一卷。定宾律师《饰宗义记》九卷。《补释饰宗记》一卷。《戒疏》二本各一卷。观音寺亮律师《义记》二本十卷。南山宣律师《含注戒本》一卷及《疏》。《行事钞》五本。《羯磨疏》等二本。怀素律师《戒本疏》四卷。大觉律师《批记》十四卷。《音训》二本。《比丘尼传》

二本四卷。玄奘法师《西域记》一本十二卷。终南山宣律师《关中创开戒坛图经》一卷。合四十八部。〔1〕

稽考这些书籍的由来,追踪在日本的流传经过,无疑是“书籍之路”研究的重要内容。但是,恰如“丝绸之路”研究对象并不限于丝绸,“书籍之路”作为精神文明传播之路,传播文明的载体可定得宽泛些,除了成卷成册的书籍,书法、题跋、尺素、文案、简牍、图籍之类也应该纳入视野。基于此,我们注意到鉴真第六次东渡的货单中,还包括如下品目,亦据大正本引录之:

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。小王真迹行书三帖。天竺朱和等杂体书五十帖。〔2〕

“王右军”、“小王”指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,他们的书法对日本影响巨大,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问题是,与此并列而数量为“二王”作品十几倍的“天竺朱和等杂体书”究竟为何物呢?“朱和”看似与“王右军”、“小王”一样是人名,但如果是唐人,则前面的“天竺”不可解;如果是天竺人,其姓名便有些古怪。

以诸本校勘,自日本东大寺戒坛院宝历十二年(1762)以后的刊本多同大正本,而古写本均不作“朱和”,如观甲本作“末和”,高山寺本作“未和”,高贵寺本作“末和”等等。〔3〕看来此二字不仅困扰现代的学者,同样让平安时代以后的抄手、刻工犯难。如高贵寺本,写了“未”,觉得不妥,划去后添写“末”字;又如安藤更生藏本,在“朱”旁注“末”、“知”,难以取舍;再如《宁乐遗文》本,在“朱”旁注了“末”、

〔1〕〔日〕真人元开: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,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105册,名著普及会1979年版,第993页。

〔2〕同上。

〔3〕高贵寺本未见,据〔日〕安藤更生译注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,便利堂1964年6月版,第24页。